

文庙御匾·诞祭·与祭社

——匾额文史之五十五

吴裕成

至今年,天津文庙已历经590年。明正统元年(1436)天津卫学的创立,为当年的军卫之城迎来崇文尚雅的标志性史事。

为了建学,而不是以卫所弟子去静海县学借读的变通,应付相关指令,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捐卫署东边住宅一所。一城驻三卫,左卫朱胜肯出头,出主张,还捐房子,天津卫记住了朱指挥的这个好,直到清康熙时,大成殿祭祀后分胙,供品猪头必给朱胜后代分一份。此其一;其二,三卫同城,依坐北朝南的方位格局,右卫卫署在西城,左卫卫署在东城——左卫指挥捐房之举,决定了文庙选址:东城。文庙邻近东门,后来的武庙选址西城,正与古代“文东武西”观念相应合。

初创起步,先立学舍、授课业,所以天津文庙的第一通碑,刻的是《创建明伦堂记》。正统十二年(1447),大成殿落成,庙学合一,规制始备。关于大殿孔子像,明代《河间府志》记,“景泰五年(1454)始塑像行祀”。天津文庙赶上了“塑像以祀”,至“嘉靖间易像为主”,朝廷推行以木主神牌替代塑像。及至清康熙,允许文庙供奉先师像,于是塑像、木主同奉,渐成常态。在这常态里的天津卫学,雍正年间随着城市经历变化。天津卫改州,卫学成了州学;直隶州升府,雍正九年(1731)州学又改为府学;三年后,府学西侧新建县学——府庙、县庙并立的范式,留存至今。

同治《续天津县志》记大成殿的御制匾额,从“圣祖仁皇帝”康

熙,至“今皇帝”同治,七帝七匾,依次录下,只是粗心出错,把康熙的、道光的,混淆误置了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御书“万世师表”匾额,悬于北京文庙大成殿,“并颁发直省学宫”。由此开始,皇帝为文庙书匾成惯例。雍正五年(1727)御书“生民未有”匾额,乾隆二年(1737)御书“与天地参”,嘉庆四年(1799)御书“圣集大成”,道光九年(1829)御书“圣协时中”,咸丰元年(1851)御书“德齐畴载”,连同同治元年(1862)所书“圣神天纵”,《续天津县志》所载御匾,就是这样陆续悬挂于大成殿的。光绪初,又增“斯文在兹”御匾。

这些匾额遭厄运,是在庚子年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。秀才刘孟扬亲历那场灾难,写下“变乱纪事”,书中记:“圣庙大成殿累朝御匾,亦均为日兵焚毁。”日本处于汉字文化圈,对孔庙及御匾的文化意义并不陌生。侵略者下狠手,烧匾额,用心可谓歹毒。占据文庙的日军,把这里当作马厩。极具侮辱性的行径,引起津门文化人的抗议。

据民国《天津县新志》所载,文庙的碑记,明代4篇,清代9篇,年代最晚的《上丁礼乐碑记》,光绪三十年(1904)镌石。碑文记,历经庚子劫难,府县文庙“宫墙无恙而钟簴缺如”,知县唐则瑀“与乡之贤士夫搜讨仪文,详稽掌故,于礼乐之器缺者补之,敝者新之”,以求上丁祭典“与平时无异”。

清朝制度,每岁春二月、秋八月第一个丁日祭孔子,称为丁

祭。在地方,这是“守土正印官”的官祭。天津府、县同城,文庙两座,丁祭之时,知府一众、知县一众各得其所。雍正五年之前,官场有“祭丙”惯例,督抚、学政之类高官,先一日在丙日祭祀。天津府县双庙建于此后,未见“祭丙”的故事。然而,津地民间却有“诞祭”风俗。

上世纪30年代,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载录清代岁时风俗: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,乡人遵制奠献,谓之“诞祭”。初时在县文庙行礼。后来,因春秋两丁,地方官致祭;孔子诞祭听任民间自祭,用事于庙,于制未合,遂借会文书院举行。书院废后,又复行于文庙。撰写者王守恂特别强调,“此应郑重以记之者也”。官祭之外,民间也要有表达的仪式,进不了大成殿,就在与文庙一墙之隔的会文书院举行。崇文重教,民风淳朴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民间还有文庙洒扫社、与祭社,同治县志记载。前者由秀才陈鼎元创立,“在社者月捐钱百文,朔望拈香”;后者由秀才郭杰创立,“在社者月捐钱六十文,为春秋丁祭聚集之用”。光绪年间《津门杂记》载,春秋两次丁祭,除官项照例备办祭品外,与祭社捐备大小彩灯,以崇祭典。辛亥革命以后,与祭、洒扫两社合一,参与文庙丁祭。1928年4月,与祭洒扫社排定《文庙朔望拈香轮值次序》,轮值者有华世奎、林兆翰、赵元礼、李金藻等名流。1935年,崇化学会带着国学讲习班进了明伦堂。

王新铭的山水画

章用秀

王新铭(1870—1960),字吟笙,清光绪丁酉(1897)举人。后以科举废,从事幕僚,曾随天津人陆锦任事多年。王是天津女学创始人之一。1907年,他在天津东马路天齐庙创办私立第四女子小学堂,为继严氏女学之后的天津早期开办的女学。1926年又经扩充,改为完全小学校,自建校起担任校长20余年。1928年天津建市,次年任教育局秘书。新中国成立后,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王新铭矢志办学,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同一般,其山水画作品尤为世人称道。其画取法明人沈周,潇洒淋漓,构图宏阔。笔者藏有其雨景水墨山水作品。此画作于1936年。画中山峦起伏,云缠雾绕。山上山下,丛林密集。茅屋坐落于树丛中、溪谷旁,山涧流畅,溪流上架一小桥,桥上一人撑伞而过,似欲同茅屋中的那位雅士相会,动静互应,静动相宜。粗毫皴点,将山间雨色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画上题诗曰:“天公欲仿米南宫,一片云烟墨色浓,冒雨人归擎短盖,山斋饱受满林风。”落款为“丙子春二月,王新铭吟笙甫写并题”,画美诗亦美,令人心旷神怡。陆辛农先生评价其山水作品“不拘成法,而磅礴之气甚足”。

水会《救火歌》

吴蓬莱

张焘《津门杂记》,清光绪十年(1884)刻印,书中记城市社区消防水会的建立和运作,如绅商捐立“水会四十多局”,如“遇警鸣锣传递,名曰串锣”,如春秋两次“呈供演戏,敬祀火德真君,设席酬劳伍善,名曰摆会”。

同一时期,世居津城的诗人于世祐长诗《救火歌》,可与之对读。诗序写道,“吾乡舆图湫隘,城市喧嚣,商贾云屯,人民星布,而沿城一带积薪如堵。每值天高风紧,丙丁作祟,时不免焉”。丙丁指火,十天干分属五行产生的说法。人口稠密,用火而积薪,使得火灾多发。长诗描述救火现场,“各分队伍纪律严,奋臂一呼齐争先”。写到器械水激子,装有水箱、压柄,压力将水喷出,“一激十丈飞寒泉”,“犹如怒蛟翻狂澜”,用来灭火。“排墙力猛如撼山,千家万户少株连”,言及防止火势蔓延的操作——截断火道。火警解除,“一钱不取古之廉”,于世祐以此赞扬水会的志愿者。

《救火歌》结尾呼吁防火:“试取名言为众宣:凡事只须防未然,曲突徙薪谋万全……”

老地名中的“新官汛”

曲振明

早年津沽,地道外有新官汛大街、新官汛一条、新官汛二条等地名。“汛”在古文中有防守的含义,明清时期军队驻防地段称为汛,并出现“汛地”“汛守”“汛兵”等名词。清代绿营内部有标、协、营、汛四种军事编制,汛是最基础的单位。

新官汛地名与盐坨有关。清代由东浮桥(今金汤桥)的盐关以下至老李公楼(今赤峰桥东侧),是长芦通纲商人储盐之地。清代官方对盐业施行专卖,在盐坨设立坨汛驻防,以稽查贩卖私盐的行为。清代天津驻防绿营有九汛,守卫盐坨的谓之坨汛,下设十九个分汛。各分汛按坨地位置命名,又分前十汛,后九汛,共有头役、散役共计一百余人。

盐坨总汛位于今河北区兴隆街南口,后来附近建有许多民房,遂以“官汛”命名,俗称“盐坨官汛”。1902年,此地被划入奥租界后,又称“奥界官汛”。随着奥租界的开发,拓宽官汛至火车站间道路,许多居住在官汛的居民迁至地道外,“以旧名加‘新’,名新官汛胡同”,后来又有了新官汛大街。

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自行车

一 镜文并摄

几十年前普通家庭常用的自行车,如今似乎一下子被边缘化了,家用自行车竟然成了怀旧的老物件。记得那时,家里想买辆自行车,需要省吃俭用靠攒钱才能实现,自行车推进胡同,街坊邻居都为之侧目。那时,大多数市民上班、上学以步行为主,实在太远的才坐公交车。

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,家庭自行车的购买需求逐步增加,进而出现供需矛盾,买一辆自行车除了要有钱还得有“票儿”(自行车购买证),甚至票证比钱更重要。最初的自行车只有黑色28直梁,不久出现了黑色和墨绿色28弯梁,再后来推出26坤车,颜色款式也更加丰富。



天津产的“飞鸽”自行车名扬海内外,随后生产的“红旗”也颇受青睐。

那时,对于新购买的自行车,天津人还要精心捌飭一番:大链盒要镶上不锈钢卡子;前后挡泥板末端要套上印花的罐头铁皮。

有条件的还把横梁、斜梁包上紫色或墨绿色平绒;车座配上人造革或布面座套,有的还为车把编织漂亮的把套,后尾灯和转铃均加装防护卡子……一个礼拜擦一次车、打一遍蜡,多数家庭还备有打气筒和修车工具。